

以聯合實驗法初探我國兵役制度 組合的民意基礎

黃韋豪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近年中國軍事擴張帶動東亞軍備競賽，美國戰略重心亦隨之東移，臺灣作為區域安全焦點，其國防政策與民意動向備受關注。本文以臺灣為案例，運用聯合分析實驗法，探討民主國家如何在公眾意見與國防需求間尋求平衡，彌補過往研究多僅討論單一要素，缺乏系統性檢視民意的缺口。結果顯示，受訪者傾向支持適度延長義務役期限，但對頻繁的教育訓練召集持保留態度，並偏好國防與社會福利支出間的平衡。次群體分析進一步發現，性別、政黨偏好與中國威脅感知不同的受訪者，對各政策特徵的偏好亦有差異。這些發現不僅為我國國防政策提供實證基礎，也為評估其他面臨類似安全壓力的東亞民主國家提供參考，豐富相關理論在高度緊張區域中的應用。

關鍵詞：國防政策、民眾偏好、聯合分析實驗法、兵役制度、槍砲與
奶油

壹、緒論：民眾態度與國防政策？

近年來中國頻繁在其周邊海域進行挑釁行為，例如 2021 年底中俄軍艦同時穿越津輕海峽、2022 年底於東海展開中俄海軍的聯合軍

演等事件，¹尤以圍臺軍演及對日本經濟區域發射導彈，更增臺海及周邊地區緊張。凱爾特（Frederik Kelter）（2023）指出，隨著中國的經濟成長放緩、青年失業率上升及社會不滿情緒加劇，中共領導人或藉對臺灣外島金門和馬祖採取軍事行動，似於其他威權政權的戰略，以轉移其國內社會焦點及團結民眾。²這些發展也使東亞區域的安全困境加深，周邊多國相繼強化軍事準備與對外安全合作，區域軍事支出與軍備調整的趨勢更加明顯。³惟對本文而言，關鍵不在於各國個別政策的細節差異，而在於整體緊張態勢如何回過頭來影響臺灣的國防政策選擇與其民意基礎。基於此，以下論述將以我國所面臨的安全挑戰

-
1. 關於日方對於區域安全的顧慮，詳細請見令和 4 年版防衛白書第一部第一章（日本防衛省，2022）。
 2. 並非所有學者對臺海局勢都如戰爭轉移注意力論（*Diversionsary Theory of War*）如此悲觀，布蘭斯（Irene Entringer García Blanes）等人透過調查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的問卷發現，大多數學者（72.5%）認為在未來一年中，中國不會使用軍事力量攻擊臺灣，而只有 6% 的人認為會發生入侵，並且對於未來主要大國間發生戰爭的前景持謹慎但相對樂觀看法（Blanes et al., 2023）。
 3. 例如，日本近年規畫大幅提高軍事支出（Reynolds, 2022），美日韓亦在緊張地緣政治壓力下尋求強化協作（Green, 2023）；相關討論亦指出，區域各國在軍備、投資與訓練等面向對美合作需求升高，但同時擔憂成為中國報復目標（Cave, 2023）。部分學者認為夾於大國競爭間的國家並非只有對抗或是扞從兩種選項，吳翠玲（Evelyn Goh）（2005: 23, 29）和麥艾文（Evan S. Medeiros）（2005: 145-167）提出「避險」（hedging）作為東亞國家避免選邊站的替代策略，結合了經濟整合與安全合作，即一方面與某一方（例如美國）保持安全聯繫，另一方面則與另一方（如中國）建立合作關係。後續相關發展請見吳玉山（2009：31-59）、郭清水（Kuik Cheng-Chwee）（2008: 159-185）、黎雅澹（Adam P. Liff）（2019: 453-491）、阮功松（2020：143-193）、薛健吾（2022：83-133）等文以臺灣、東南亞各國、日本、越南等國家作為案例進行的相關研究。

與政策調整為核心。

我國不僅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點名為最危險、最接近戰爭的地方，更是直面來自中國安全挑戰的第一線，除中共對我國傳統侵擾常態化，也展開大量介於「灰色地帶」的混合式威脅和行動。⁴面對中國威脅升高與區域緊張態勢，我國國防部遂提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方針，並以「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為核心戰略（中華民國國防部，2023：93）。較前一年度增加 12.5% 的國防預算以強化既有戰力，並結合全民防衛、強化義務役與後備訓練，意在藉此提高中國進犯成本，嚇阻冒進並維護區域穩定。特別是在不對等聯盟中，弱勢國若願承擔高政治成本（如延長役期、提高軍費占比），可向盟友發出可信的「昂貴訊號」，降低被視為「搭便車」的疑慮（Morrow, 1993: 203-233; Blankenship, 2021: 691-724）。然而，是否採納這些昂貴措施，終究取決於國內民意是否買單——這正凸顯探究民眾偏好的必要性。

由此可見，我國現行的國防政策有別以往以「專業國軍」為導向，建立「機動性高、量少、質精、高效能及高精準打擊之戰力」（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45；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64），在蔡英文政府後，我國便改採結合全民國防與專業軍隊的整體戰略；就國防部近年官方文件而言，2023 年《國防報告書》明確以「防衛固守、重層嚇阻」作為軍事戰略主軸，並將其與不對稱戰力籌建、後備戰力整合及全社會防衛韌性等施政重點相互連結；2025 年《國防報告書》則在此基礎上延伸提出「多域拒止、韌性防衛」等作戰整備方向，進一步凸顯軍民整合與韌性建構的重要性（中華民國國防部，2023：63、93；中華民國國防部，2025：54-55）。現行政策更需要民眾的支持與肯定，而吳冠昇等人（Wu et al., 2023）也發現隨著政

4. 關於中共近年來對我國威脅和侵擾行動，請見歷年中華民國國防相關出版。

府對於全民國防的倡議和 NGOs 的合作，相對於 2020 年，有更多民眾較願意主動參與防衛行動。另一方面，民主體制下涉及徵兵、增稅或財政資源重分配的國防措施，往往同時引發安全支持與成本反彈兩種動員邏輯；當政府政策與民意出現落差，不僅可能削弱嚇阻效果，也可能在選舉政治中反噬執政者的合法性。⁵

鑑於上述區域安全形勢的變化及我國國防政策的轉變，理解民眾對於國防政策的態度和偏好變得尤為重要。就制度面而言，義務役近年已朝一年役期方向調整，並配合強化訓練；後備方面則以教育召集提升訓練強度（含推動 14 天新制）為改革重點，另有以點驗、校閱為目的之點閱召集等制度安排。⁶在此制度脈絡下，本文進一步採用聯合分析法（聯合實驗）設計線上問卷，將役期長度、教召安排與是否納入女性教召等兵役制度核心要素，與軍購國產比例及國防一社福預算配比等政策選項一併置於同一組合框架中，系統性評估民眾在多重政策屬性之間的取捨。相較於以單一題項詢問支持或反對的傳統測量方式，此設計得以估計各政策屬性及其分級對受訪者選擇的平均邊際效果，進而呈現民意偏好的相對權重與政策組合的可接受邊界。本文的貢獻在於以可比較的量化方式，將過往常被分散討論的兵役制度爭點與資源配置選項納入同一分析架構，並提供關於不同族群在政策取

5. 例如日本岸田政府在 2022 年提出大幅增加軍費後，國內也出現反彈的意見，如有接近 65% 的民眾表示反對（西尾邦明，2022），即便隨著中國威脅和美日韓的新合作里程，日本民眾仍強烈反對為增加軍費而加稅，並使岸田內閣的支持率處於倒閣的邊緣（張仕仁，2023）。

6. 依相關規範及主管機關說明，後備召集制度中之教育召集，係在退伍後一定年限內依規定之次數上限分次實施，屬以訓練整備為目的之召集。訓練天數方面，過去多採每次五天到七天之舊制安排；近年為提升訓練強度與部隊整合程度，推動每次 14 天之新制並逐步擴大適用。相較之下，點閱召集（本文所稱「點召」）以點驗、校閱為主要目的，通常每次天數較短，並依年度計畫與編組需求辦理。

捨上可能存在差異的經驗證據。

首先，以臺灣國防政策爲主的相關文獻皆指出，民眾意見對於國防政策規畫與資源配置的重要性（陳勁甫、李樹幹，2006：85-128；楊仕樂，2009：85-123；陳偉華，2010：59-97；陳偉華，2014：63-103），但缺乏進一步的因果關係經驗證據之支撐；另一方面，以美國案例的相關研究（Ostrom & Marra, 1986: 819-824; Bartels, 1991: 457-474; Kriner & Shen, 2016: 1419-1445; Tomz et al., 2020: 119-143）也肯定民眾意見對美國國防政策的重要性，但多聚焦在美國國防支出的多寡或民眾對於海外使用武力的偏好，並未綜合探討民眾在不同國防政策間的偏好組合，因此本文將深入探討民意對國防政策制定的影響。本文參考我國國防報告書與輿情討論⁷在聯合分析設計中納入五項屬性——義務役役期、教召頻率、是否納入女性教召、國產武器裝備比例及國防與社福預算配比——分別對應人力動員、裝備採購與財政分配三條決策主軸，能真實呈現國防決策的必要權衡。透過這種方式，本文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民主制度下國防決策的複雜性，並爲相關理論與分析提供新的視角。

其次，即便近年來有不少以臺灣爲個案的研究突破上述在分析單位的局限，試圖結合民眾意見與政府政策，例如吳重禮和林民偉（Wu & Lin, 2024: 131-170）透過問卷調查研究詢問美國對臺支援的意願和臺灣民眾對美國防衛的期待，初探兩國民眾偏好在準聯盟關係下的互動，而他們在後續研究中更進一步提出可能影響美國民眾支持對臺用兵的條件：符合美國民眾心中「具體」的「自身利益」（Wu & Lin, 2026: 2-5）。然而，防衛意願相關研究在民意與政府決策間可能存在落差，且落實防衛意願的政策方針不僅有出兵協防一種。因此

7. 例如黃子杰和張梓嘉（2023）於公視新聞中介紹了首次女性教召與朝野各方意見；此外，我國國防部 2023 年國防預算的重點在「機艦國造」，持續提升我國國產裝備之供應。

本文透過直接分析民眾對「具體」政策的支持程度，這種方法不僅提供了更直接的民意反應，還能更準確地捕捉民眾對國防政策的實際偏好。另一方面，本文採用的聯合分析實驗法突破了過往研究通常僅探討單一國防政策方針的限制，如軍事支出的多寡（Hartley & Russett, 1992: 905-915）或是否使用徵兵政策（Horowitz & Levendusky, 2011: 524-534）。相較之下，本文允許受訪者同時綜合考量多個政策面向，從而更全面地分析民眾對整體國防政策的偏好。這種多面向的分析方法不僅能夠捕捉不同政策之間可能存在的權衡關係，還能揭示民眾對各種政策組合的整體評價，從而提供更為細緻和貼近現實的研究結果。

在政策意涵上，本文提供一個可操作的比較基準：在不同政策屬性同時變動的情境下，哪些屬性較容易改變民眾的整體支持度、哪些屬性則相對不敏感。此一證據有助於釐清兵役制度改革與資源配置討論中，民眾偏好究竟主要回應「個人義務負擔」的調整，或更在意「財政排擠」與「自主防衛」等國家層級選擇；同時也指出，若政策方案同時牽動多個爭議屬性，其政治可行性可能取決於跨屬性之間的補償組合，而非單一政策工具的調整。

貳、文獻回顧：訊號理論與國防政策

雖然東亞區域國家面臨上述區域穩定與安全挑戰，但區域內國家無力單獨以其軍事實力對抗中國對於領土和爭端地區的企圖，且該區域也缺乏類似北約的集團安全合作機制，因此各國在安全上多依賴來自美國的安全保障。在不對等聯盟中，弱勢國常以高政治成本政策向盟友傳遞可信承諾（Morrow, 1993: 207-233; Blankenship, 2021: 691-724）。在當下美中競爭白熱化的區域情勢下，臺灣作為安全風險第一線，更需在不對等安全關係中向美國傳遞可靠的承諾訊號，以維持安

全保障的可信度。⁸

在不對等聯盟的研究中，「昂貴訊號」的核心命題是：弱勢國若能採取具有可見成本，且難以由缺乏決心者仿效的政策行動，便可能向安全提供者傳遞其承諾的可信度。此類訊號可降低被視為「搭便車」或承諾不足的疑慮，進而有助於穩定聯盟關係。相關研究因此常以軍事支出、出兵行動或其他高成本承諾作為可觀察指標，用以分析弱勢盟國如何透過「承擔成本」來換取安全保障或提升在聯盟中的相對位置，例如，莫羅（James D. Morrow）說明被保護國可透過增加軍備支出等方式向盟友釋放承諾訊號，以降低承諾不確定性並強化聯盟穩定（Morrow, 1993: 207-233）；坎南（J. Andrés Gannon）和肯特（Daniel Kent）則指出弱勢盟國可藉由展現高度承諾在聯盟互動中獲得優勢，反映不同實力國家在聯盟中的策略選擇（Gannon & Kent, 2021: 889-918）。相對地，從安全提供者的角度，布蘭肯希普（Brian Blankenship）亦強調提供者可能透過施壓、設定條件或提出「分攤負擔」要求，促使盟友提高軍事支出，以降低自身成本並維持聯盟可信度（Blankenship, 2020: 1017-1030; 2021: 691-724）。綜合而言，上述研究共同凸顯：在不對等聯盟之下，「承擔成本」本身可能被用來塑造承諾的可信性，而軍事支出與動員改革等政策，因其成本可觀且政治可見性高，遂成為典型的昂貴訊號候選者。

然而，昂貴訊號文獻亦隱含一項重要延伸：昂貴訊號能否成立，並非僅取決於「成本大小」，更取決於成本在國內政治上是否可被承受、能否被持續及是否被社會視為公平。若高成本政策引發強烈民意反彈或分配衝突，政府即可能難以長期推動，訊號反而因「不可持

8. 臺灣並非美國的正式盟邦，因此蔡宗漢等人認為應該用安全保證（security assurance）的概念來描述臺美關係（Tsai et al., 2024: 16-17），但觀其文章論述，安全保證的理論預期和聯盟理論方向大體一致，因此本文並未以安全保證理論另行描述臺美關係。

續」而失去可信度；反之，若政策成本能被多數民眾接受，昂貴訊號才更可能轉化為可預期、可重複的承諾表現。從這個角度看，兵役制度改革與後備動員強化之所以在臺灣情境中特別關鍵，正在於其成本高度可見且直接落在個人身上：役期延長、教召頻率與訓練強度調整，乃至義務分配範圍的擴張（例如是否納入女性），都會立即改變公民承擔的時間與機會成本，並觸及公平性與責任分擔的爭議。這意味著，即便在外部威脅升高的情境下，政府是否能以此類高成本政策展現防衛決心，仍受制於國內民意所界定的政治可行性邊界。

基於此，本文將昂貴訊號視為研究背景之一：在役期延長、後備動員強化與財政配置調整等措施可能被視為展現防衛決心的高成本政策之下，釐清民眾對不同政策組合的可接受邊界，有助於理解改革的政治可行性與承諾可信度的內在條件。惟本文的聯合分析設計主要用以衡量國內偏好與取捨，並未直接測量外部行為者（如安全提供者）如何解讀這些政策訊號；相關跨國解讀機制與訊號效果，仍待後續研究以更機制導向的研究設計進一步檢驗。

國防支出除了在聯盟中扮演傳遞訊號的重要角色外，文獻中更指出軍事支出和其他政府支出的競爭關係，民主國家常因受制於其他國內利益團體，執政黨較願意將多數國內資源挹注於非軍事部門（Palmer, 1990: 190-211; Russett, 1990: 1-201; Hartley & Russett, 1992: 905-915; Oneal & Russett, 1999: 423-442; Fordham & Walker, 2005: 141-157）。這類研究也構成「槍炮與奶油取捨」文獻的核心命題：在既定財政約束下，國防支出擴張常被視為可能排擠社會福利與內政支出的政策選擇，因而更容易引發分配政治的爭議與選舉問責（Russett, 1982: 767-777; Mintz, 1989: 1285-1293）。不過，較新的研究亦指出，公眾未必必然以零和方式理解國防與社會支出；在特定情境下，國防支出可能被視為帶動就業或經濟活動的公共投資，使民眾對兩者呈現「並存」甚至互補的偏好（Williams, 2019: 1193-1221）。因此，本文將「國防—社福預算配比」納入政策組合屬性，

旨在直接衡量民眾在安全需求與分配後果之間的取捨邊界，並檢驗其偏好究竟更接近「排擠式取捨」或「並存式理解」。⁹

以美國為例，羅塞特（Bruce Martin Russett）指出，若民眾反對戰爭、不希望國家擴大軍備，執政黨會順應民眾期待刪減軍事支出（Russett, 1990: 1-201）。換言之，結合上述理論與實證經驗可知，若一個國家的國民並不希望執政黨將有限的資源大量挹注國防，該政黨若不回應民眾的期待，恐將在日後選舉失去政權。相對於美國案例，陳偉華便指出民眾偏好對我國國防政策的重要性，不僅我國國防支出受到民眾偏好影響，民眾自我認同也影響國軍信心和武器採購等方面的國防支持（陳偉華，2010：59-97）。其中「反軍事」輿論則更進一步影響國防政策、兵力結構調整和相關資源的配置（陳偉華，2014：63-103）。

除兵役與預算取捨外，軍備獲得途徑亦構成國防政策組合中不可忽視的面向。就臺灣政策脈絡而言，國防部近年官方文件在軍事戰略與整體整備方向上，除延續「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的戰略框架外，亦強調「韌性」與「全社會防衛」等整體建構方向；在此脈絡下，提升自主研發與國防產業能量常被賦予強化戰時韌性、降低外部供應不確定性與提升持續作戰能力的政策意涵（中華民國國防部，2023：

9. 除「槍砲或奶油」之研究外，亦有一支相關文獻不以「排擠／取捨」為核心，而是轉向探討國防（或戰爭）支出如何被籌資與正當化。例如，稅收與財政負擔的研究強調政府以何種課稅方式分攤戰爭成本，將影響民眾支持與政治可行性（Flores-Macías & Kreps, 2013: 357-371; Kriner et al., 2018: 43-64）；另有研究聚焦於菁英論辯與公共論述如何形塑對國防支出來源與其合理性的認知（DiGiuseppe, 2015: 317-338; Cox & Dincecco, 2021: 851-866）。本文在此提及上述文獻，意在指出「國防支出」除了與社福支出存在配置取捨外，其籌資方式本身亦可能構成獨立的政治衝突面向；惟本文實驗設計所操控的屬性為「國防—社福預算配比」，故籌資途徑（如稅收安排）留待後續研究延伸。

134-138；中華民國國防部，2025：126-133）。相較之下，海外軍購雖可能在短期內補足戰力缺口並提升互通性，但同時也伴隨供應限制、交付不確定性與依賴風險等考量。國防產業研究亦指出，追求「降低進口依賴」往往涉及成本、技術門檻與產業政策的權衡，各國常在自主化與外部供應之間形成長期張力（Bakir et al., 2025: 553-560）。因此，本文將「海外軍購武器國產占比」納入政策組合屬性，旨在衡量民眾是否將「自主研發」與「對外採購」視為會影響整體支持度的重要政策維度，並與動員制度及財政配置一併比較其相對重要性。

在理論層次上，聯盟政治與軍售研究進一步提醒，軍援與軍售不僅是軍備交易，也可能被理解為支持訊號的一環，進而影響受援方對安全承諾的預期與其軍事努力配置（DiGiuseppe & Shea, 2021: 1067-1089）。亦有研究從「軍售所含訊號」的角度，系統化討論武器移轉在國際政治中的多重意涵（Spindel, 2025: 164-204），以及武器移轉與依賴關係可能對外交衝突及政策選擇產生影響（Kinsella, 1998: 7-23; Willardson & Johnson, 2022: 191-213）。基於此，本文在納入「國產比例」屬性時，也同時意識到其可能牽涉「自主能力」與「對外連結」之間的政治經濟張力；惟本文聯合分析設計主要用以衡量政策組合偏好本身，並未直接測量民眾是否據此推論對外軍售期待或盟友承諾強度的機制，相關訊號如何被民眾理解與外部行為者如何解讀，仍待後續研究以機制導向設計進一步檢驗。

在探討國防政策時，學者們除關注軍事支出等傳統指標外，也開始重視兵役政策作為另一種重要的安全訊號。兵役政策是影響一國國防策略的核心要素，不僅直接關乎軍事資源的分配與人力的調動，還反映了國家對國防事務的重視程度及對安全威脅的評估。霍洛維茲（Michael C. Horowitz）等人指出（Horowitz et al., 2017: 1682-1710），徵兵制度因其強制性質，被認為是一種可信的國家安全承諾，這種制度化的政策選擇可以反映國家對戰爭的準備程度和對

國家安全的承諾，進一步強化國際聯盟的穩定性（Kofroň & Stauber, 2024: 665-689）。因此，兵役政策不僅是軍事資源配置的工具，也是一種傳遞國家防禦態度的訊號，對國內外均具有深遠影響。

在國內層面，兵役政策對社會整合及經濟資源分配有重要影響。哈達（Maya Hadar）和海基寧（Teemu Häkkinen）指出，徵兵制度不僅增強國民的凝聚力，也促進平等意識的培養，並強化國家認同。透過徵兵，公民在服役過程中經歷共同的訓練和責任，這種集體經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淡化社會分歧，形成一致的國家認同。從這一角度看，兵役政策的意涵遠超越軍事，其本身就是一種塑造國民意識的機制，有助於建立更強大的公民與國家連結。徵兵亦被證實具有社會—經濟雙重效應：在社會層面，可透過共同服役經驗提升國家認同與跨階層凝聚力（Hadar & Häkkinen, 2020: 188-218）；在經濟層面，徵兵相當於將軍事人力成本外部化為青年「隱性稅收」，於財政壓力下尤具吸引力（Poutvaara & Wagener, 2011: 154-176）。¹⁰

在民主國家，兵役改革須取得民意授權。克里納（Douglas L. Kriner）和沈（Francis X. Shen）的研究顯示，徵兵會降低公眾對海外用兵的支持（Kriner & Shen, 2016: 1419-1445），而卡爾科斯基（Miina Kaarkoski）和海基寧及庫里斯（Ioannis Choulis）等人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公眾輿論在合法化徵兵改革方面具有重要影響力（Kaarkoski & Häkkinen, 2022: 195-218; Choulis et al., 2021: 240-251）。政治菁英經常利用民意來支持徵兵制度的改革，以增強政策的合法性並提升社會的支持度。因此，對於兵役政策的分析，應將民眾

¹⁰ 但阿薩爾（Victor Asal）等人指出，一國是否實行徵兵政策往往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例如前英國殖民地普遍不採行徵兵制，這反映出政策選擇的歷史延續性與文化影響。而經濟發展似乎與徵兵政策沒有關聯，作者指出，軍事政策決策更多地受到政治文化和軍事傳統的影響，而不是各國經濟能力差異所致（Asal et al., 2017: 1456-1481）。

支持納入考量，特別是在推行新政策或改革時需要獲得廣泛的民意基礎。但上述研究中，一方面缺乏具因果推論之系統性分析，另一方面則將兵役政策與其他國防方針（例如軍事支出占比）一同進行討論。此外，在兵役制度之外，後備動員的設計亦同樣牽涉民意可行性：教召頻率與訓練強度關係到個人時間與機會成本，而教召對象（尤其是否納入女性）則直接觸及義務分配與公平性認知。換言之，動員制度的政治成本不僅體現在「是否徵兵」，也體現在「如何分配動員負擔」與「動員強度如何調整」，這也正是本文在屬性設計中納入教召頻率與教召對象的原因。

然而，兵役政策的改變也可能帶來重大的政治風險，臺灣延長義務役期即是一例，例如蔡英文政府在 2022 年提出延長兵役的政策規畫後，國民黨便在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提出「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的口號，甚至有可能影響 2024 年的總統大選結果（李澄欣，2022）。正是基於潛在的政治風險，使得改變兵役政策成爲一種特別昂貴和可信的訊號。在訊號理論的框架下，政府願意承擔這種政治風險來改革兵役制度，恰恰表明其對國防事務的高度重視和堅定承諾。¹¹

綜上所述，臺灣的案例提供一獨特機會理解民眾對這類政策的看法，因不僅涉及提升國內防衛能力，同時可能影響公眾對國防事務的支持度、國際社會對臺灣防衛決心的認知，以及臺灣在複雜地緣政治環境中的戰略地位。然而，既有研究多分別討論兵役制度、軍事支出或其他國防方針，較少在同一分析架構下檢視民眾如何同時權衡「動

11. 與日本、南韓等國不同，我國並非美國在傳統定義下的正式盟邦。正如蔡宗漢等人所指出，臺美關係更適用安全保證的概念來描述（Tsai et al., 2024: 16-17）。這種特殊的地位使我國在尋求美國安全保障時，不應該將美國的安全保證視爲理所當然（Czulda, 2014: 8-43），反而應面臨更大的壓力以展示防衛決心。從訊號理論的角度來看，我國需要提供更強烈、更可信的防衛訊號，以換取美國的安全保障。

員制度」與「資源配置」等多重政策面向。本文因此採用聯合分析法，將役期、教召安排與教召對象等兵役制度要素，與軍備來源及國防一社福預算配比等資源配置選項納入同一實驗架構，以估計各政策屬性及其分級對選擇結果的平均邊際效果，進而將討論由抽象的支持／反對推進到可比較的政策組合評估。

參、研究設計

現有文獻在研究國防政策和民意關係時，往往聚焦於單一政策面向，如軍事支出多寡或兵役制度轉變。然而，這種方法難以掌握民眾在眾多因素間選擇的綜合偏好，為彌補這一缺口，本文採用聯合分析問卷調查實驗法，允許受訪者同時考慮多個政策面向，從而更全面地分析受訪者對整體國防政策在不同特質取捨的偏好。聯合分析最初由海恩穆勒（Jens Hainmueller）等人及霍普金斯（Daniel J. Hopkins）所提出，其優勢在於能同時評估多個政策特徵對受訪者選擇的影響，並能夠評估這些特徵的因果效應（Hainmueller et al., 2014: 1-30; Hainmueller & Hopkins, 2015: 529-548）。透過隨機化政策特徵的組合，聯合分析法能將受訪者置於接近真實決策的「多屬性取捨」情境中，因而在敏感議題上相較傳統單題式問卷更能降低社會期許偏誤（亦即受訪者因社會期待而傾向給出較「政治正確」答案的風險），¹²並在固定資訊量的前提下減輕受訪者逐題評估所造成的認知負擔。堀內勇作等人亦指出，此類設計有助於降低問卷作答中的社會正當性（social desirability）疑慮（Horiuchi et al., 2022: 535-549）。進

¹²在政治學研究中，社會正當性偏誤尤其容易出現在涉及愛國、族群、歧視、暴力、戰爭等具有強烈道德評價與社會規範壓力的議題上；受訪者可能因自我呈現或避免被負面評價而調整回答，導致偏好測量出現系統性扭曲。由於國防與兵役屬高度規範化且政治敏感的政策領域，若僅依賴單題式表態題，研究結果較可能受到此類偏誤影響，故本文在方法設計上特別重視以更接近「實際取捨」的作答情境進行測量。

一步而言，雖然既有研究多已注意到民意與國防政治（特別是軍事支出）之間的相關性，但希格斯（Robert Higgs）和基爾杜夫（Anthony Kilduff）（1993: 227-238）提醒，兩者之間仍可能存在反向因果或政策菁英影響輿論等內生性問題；因此，若欲更嚴謹地評估不同國防政策方案如何改變民眾支持度，仍需要結合更強的因果推論設計。本文採用聯合分析問卷調查實驗，正是爲了在可行的資料蒐集條件下，更系統性地辨識政策特徵對民意偏好的因果效果。

近年來，安全研究和國防策略領域的學者（Godefroidt & Langer, 2023: 410-427; Horiuchi & Tago, 2024: 1798-1824; Dill et al., 2024: 1460-1478; Kiratli, 2024: 1257-1279）也開始廣泛應用這種方法。例如堀內勇作和多湖淳運用此方法聯合分析探討日本民眾對美軍基地的態度。他們發現，日本公眾對美軍基地的支持度受基地的位置、規模、經濟影響等綜合因素共同影響（Horiuchi & Tago, 2024: 1798-1824）；迪爾（Janina Dill）等人透過聯合分析烏克蘭民眾在面對不同程度威脅時，對不同防衛策略的成本效益分析（Dill et al., 2024: 1460-1478）。這些研究充分展示聯合分析在安全研究領域的應用潛力，能夠揭示在面臨多重安全挑戰情況下，政策選擇背後的複雜因果關係。

除了應用面向外，聯合分析法之所以特別適合用於國防政策偏好的研究，亦在於其設計上的因果辨識優勢。相較於傳統單題式問卷難以拆解多維政策方案的相對重要性，聯合分析法透過將多個政策「屬性」及其「分級」以隨機方式組合呈現，要求受訪者在多次「強制二選一」任務中作出取捨；研究者即可據此估計各屬性分級對選擇結果的平均邊際效果，並在設計上降低受訪者背景差異造成的混淆影響、強化內部效度（Hainmueller et al., 2014: 1-30; Bansak et al., 2021: 19-41）。同時，本文採線上樣本確實可能在年齡結構（例如高齡族群樣本較少）上與母體存在落差；然而，方法上的「補償機制」在於：聯合分析法的關鍵推論主要依賴於屬性分級的隨機分派，而非

樣本的完全代表性，因此即便使用非機率樣本，仍可在一定條件下提供可信的因果效果估計；至於外部推廣則需審慎界定，並可透過配額控制、加權或補樣等策略提升代表性，而此亦與調查實驗文獻對「內部效度可成立但外部效度需另行界定」之討論方向一致（Mullinix et al., 2015: 109-138; Coppock, 2019: 613-628）。

本文透過 Rakuten Insight 線上調查公司，從 2023 年 12 月 7 日到 12 日招募 800 名臺灣受訪者，¹³ 並按性別和戶籍地進行配額抽樣，使樣本分布趨近於全國分布狀況。¹⁴ 每位受訪者需要完成九次強制性（forced-choice）的政策偏好二選一，每次選擇涉及一個詳細說明政府實施國防政策組合，參考上述兵役與國防支出文獻的討論與我國當前國防政策辯論的核心爭點，其中包含以下政策特徵：（A1）義務役兵役期限、（A2）教育訓練召集頻率、（A3）教育訓練召集對象、（A4）海外軍購武器國產占比、（A5）國防和社福預算比例。¹⁵ 另外，

13. 經費來源為國科會計畫編號：112-2410-H-110-097。

14. 本研究採用性別與戶籍區域（北北基桃、竹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東、宜花東澎金馬）配額抽樣，雖非嚴格意義下的隨機抽樣，但在兩項配額變項上與全國人口結構高度貼近。依內政部戶籍人口統計資料顯示，2023 年 6 月底全國男性與女性分別占 49.3% 與 50.6%；本研究有效樣本的男性為 48.2%，女性為 51.8%，兩者差距不足一個百分點。至於區域分布，2023 年 12 月底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與離島的人口比重分別為 39.4%、26.2%、29.0% 與 5.4%，而本研究樣本對應比例為 39.8%、26.1%、28.3% 與 5.8%，同樣僅有微幅差距。換言之，儘管樣本並非嚴格代表全國人口，但在性別與區域兩個關鍵維度上與母體結構幾乎重疊，有助於降低在這兩項維度上的結構性偏差。惟年齡、教育等其他特徵未納入配額控制，故本文對整體母體之推廣仍須審慎；相關特徵之可能影響已於異質性分析與研究限制中另行說明。人口統計資料請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629112152/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15. 為回應樣本數是否足以支撐本文推論的疑慮，我們另依盧卡奇（Martin

為避免不同特徵出現順序的影響，因此將上述特徵的先後順序隨機化處理；換言之，不同受訪者將看到不同的特徵排序。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主要分析未另行將年齡、教育等受訪者特徵納入為控制變項，其理由在於，聯合分析法的關鍵辨識基礎來自各政策特徵分級在受訪者面前的隨機分派，因此平均邊際效果（average marginal component effect, AMCE）的估計在理論上不依賴年齡或教育等控制變項即可進行因果推論；納入控制變項通常僅影響估計精確度，而非修正系統性偏誤。基於模型透明度與可解釋性考量，本文主要結果以不加控制的估計規格呈現；至於年齡、教育等未納入配額控制之特徵可能影響外部推廣之程度，本文則於異質性分析與研究限制中另行討論。本次問卷中其他題目與題項請見附錄三。

不論是從我國政府 2024 年的《國防報告書》、《國軍兵力結構調整方案》或輿情討論，義務役役期長度、教召頻率與是否納入女性教召已成兵役制度改革的核心議題。這三項屬性直接決定公民須承擔的時間與機會成本，因而構成向內外傳遞防衛決心的「昂貴訊號」。在民意層面，它們可能增強戰備能力，卻也因加重個人負擔而引發不滿。其中，「教召頻率」在本文的操作化並非僅以年化後的平均頻率（例如「每兩年一次」）作為唯一意涵，而是刻意採用政策溝通中常見的規範表述，結合最低要求／總量上限（「至少」與「最多」）及承諾時間窗等面向。換言之，即便部分取值在年化頻率上可能相近（例如「四年兩次」與「八年四次」），其政策含義仍可能因義務期間長短、負擔是否集中及規範框架差異而引發不同的民意反應。

Lukac）和斯特凡內利（Alberto Stefanelli）提出的模擬方法（Lukac & Stefanelli, n.d.），使用其公開之 Shiny 工具，以本研究設計參數（N=800、每人九次強制二選一任務，並以本研究屬性中分級數最多者作為保守設定）進行檢定力（power）分析。結果顯示，在假設中等幅度的效果大小（例如 AMCE=0.05）下，本研究設計之預測檢定力為 97%，相關設定與圖示請見附錄一。

相較之下，軍購武器國產比例與國防—社福預算配比則屬國家層級的結構性選擇。前者呼應 2023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所倡議的「國防不能僅仰賴對方善意」，¹⁶提高自主研製比重能增強戰時韌性，惟仍須在美國軍事合作與外購之間取得平衡；後者則體現經典「槍炮與奶油」文獻（Russett, 1990: 1-201），任何向國防傾斜的財政調整都可能引發福利排擠的政治爭議，引發民眾對排擠福利支出的擔憂。上述各特徵的描述和取值請見表 1。¹⁷

表 1 國防政策組合的特徵與取值

特徵	取值				
延長兵役期限	四個月	一年		二年	
教召頻率	一年至少一次	四年至少兩次	八年至少四次	最多八次	
女性是否需要接受教召	是			否	
軍購外國武器占軍事預算	5%	10%	20%	30%	50%
國防—社福預算	國防 20%；社福 80%	國防 40%；社福 60%	國防 50%；社福 50%	國防 60%；社福 40%	國防 80%；社福 20%

受訪者將根據這五個不同的政策特徵，在九輪中選擇其相對偏好的政策方案。本文以二元選擇的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估計各方案被選擇之機率，並依聯合分析法的標準做法計算每一

16 其中包含各種加強國防軍備自主研發，例如「國艦國造」、「國機國造」、「潛艦國造」、天弓飛彈等武器研發、生產計畫。

17 本文另以將分配到極端取值（國防 80%；社福 20%）的選擇剔除後，以 AMCE 分析，發現各屬性之效果方向與顯著性皆與主模型一致，顯示結果對取值設定具高度穩健性，請見附錄二。

政策特徵分級的 AMCE。¹⁸直覺上，AMCE 衡量的是在其他政策特徵依實驗設計隨機變動的情況下，將某一政策特徵由「對照取值」改為「特定取值」時，方案被選擇機率的平均變化幅度（Bansak et al., 2023: 500-518）。在推論上，由於各政策特徵及其分級係以隨機方式組合呈現，AMCE 可作為政策特徵效果的因果推論依據。本文並以受訪者為群聚（cluster）的穩健標準誤估計信賴區間，以反映同一受訪者多次作答所造成的相依性；當信賴區間不包括零，即表示相對於對照取值，該政策特徵取值對公眾選擇具有統計上可辨識的影響。此一做法使本文得以比較不同政策選項在公眾中的相對重要性，並理解受訪者如何在多重政策目標之間權衡。

除了上述以樣本「平均趨勢」進行的分析外，本文亦關注受訪者間政策偏好的異質性。若僅呈現整體 AMCE，可能忽略不同社會群體在成本分擔與威懾需求上的落差，而這些落差往往是民主決策能否被視為公平，進而獲得政治支持的關鍵。為評估這些潛藏差異，本文以「邊際平均數」（marginal means, MM）呈現各群體在特定政策取值下的平均支持水準，並比較性別、教育程度、政黨認同與中國威脅感知等背景變項；相較於 AMCE（相對差異），MM 更便於讀者直接理解不同群體對各政策取值的「絕對支持度」（Leeper et al., 2020: 207-221）。據此，本文進一步辨識哪些群體對義務負擔、動員強度

18 以下為 AMCE 與 MM 的簡式表示，更詳細的討論與應用請見利珀（Thomas J. Leeper）等人（Leeper et al., 2020: 207-221）、班薩克（Kirk Bansak）等人（Bansak et al., 2023: 500-518）、黃紀和傅澤民（2025: 117-124）。令 $\hat{p}(\cdot)$ 為二元選擇羅吉斯迴歸模型之「方案被選擇」預測機率。對於第 k 個政策特徵的分級 a ，其邊際平均數（MM）定義為：固定 $A_k = a$ ，並對其餘政策特徵 A_{-k} ，依實驗設計之分布取平均的預測選擇機率：

$$MM_k(a) = E_{A_{-k}}[\hat{p}(Y=1 | A_k=a, A_{-k})],$$

平均邊際效果（AMCE）則為該分級相對於基準分級 a_0 的邊際平均數之差：

$$AMCE_k(a) = MM_k(a) - MM_k(a_0)$$

或資源配置更為敏感，並據以界定主要結果的適用範圍與可能的政治分歧來源。

肆、研究發現

本文提出一個可涵蓋受訪者對不同國防政策特徵偏好的分析框架，並提供對各類國防政策組合之受訪者偏好的綜合評估。圖 1 為所有受訪者對國防政策特徵偏好的 AMCE 估計。在義務役兵役期限方面，相較於問卷施行當下仍實行的四個月方案為對照組，平均而言，受訪者在 95% 信賴區間的範圍下，將兵役時間延長至一年的國防政策，可使受訪者對政策支持率提高 9%，此結果顯示受訪者認識到當前安全環境下需要加強國防實力，這趨勢與近期的民調問卷結果相似。¹⁹ 但若是延長至兩年的方案，也可提高受訪者對國防政策的偏好，但兩年役期的信賴區間與對照組的四個月方案（虛線）重疊，可知這兩個方案並無法在統計上顯著影響受訪者對國防政策的支持程度。

另一方面，關於教育訓練召集的頻率，²⁰ 以「每年至少一次」為對照組（虛線）。在 95% 信賴區間下，「四年至少兩次」的方案對支持度呈現約一個百分點的正向變化，顯示相較於每年至少一次的高頻方案，受訪者對較為緩和的召集安排有較高接受度。然而，「八年至

¹⁹ 根據國防院 2024 年 3 月份民調顯示，有 83% 的民眾支持延長兵役政策，詳細數據請見國家安全研究院國防安全民意調查（<https://indsr.org.tw/safetyInvestigation?uid=45>）。

²⁰ 本文「教召頻率」之取值係依政策語境以規範表述操作化，除反映頻率外，亦包含承諾時間窗與「至少 / 最多」等框架差異；因此部分取值在年化後可能相近（如「四年兩次」與「八年四次」），但其政策含義不宜僅以平均頻率等同視之。以下結果應理解為受訪者對不同召訓義務表述方式之偏好反應。

少四次」與「最多八次」等較低頻方案相較對照組並未呈現統計上顯著差異，但估計方向整體偏向較低頻。綜合而言，教召頻率在整體支持度上的影響幅度有限，但偏好方向較一致：民眾傾向接受較不頻繁（較緩和）的召集安排，而不偏好更頻繁的教召。在教育訓練召集對象方面，當以「是」為對照組（虛線），「否」的方案將在 95% 信賴區間的範圍下，顯著地提高受訪者對國防政策 7% 的支持度；換言之，這結果顯示我國受訪者仍反對將女性納入戰備訓練的對象。整體而言，受訪者對於強調自身直接相關的國防政策有顯著的偏好。就政策含意而言，若欲提升後備訓練成效，較可能取得支持的路徑是強化訓練品質與配套（例如可預期的召集安排與成本補償），而非僅透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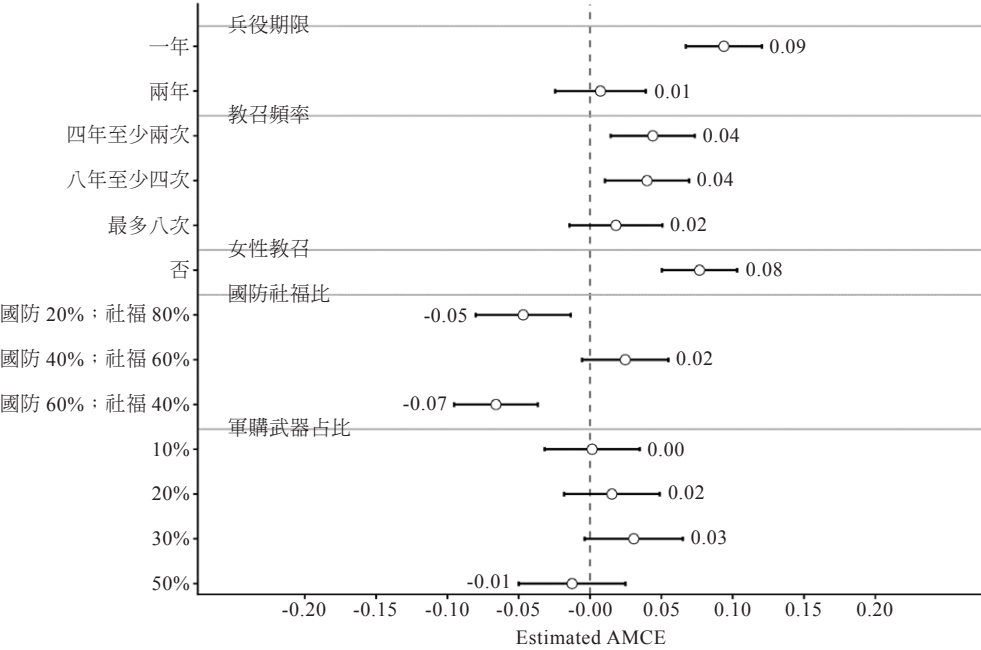


圖 1 所有受訪者對國防政策特徵的偏好（AMCE 估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提高召集頻率來擴張動員。

相對於上述三個直接影響受訪者個人參與的國防政策特徵，以下將討論另外兩個強調由上而下的國防方針。對於軍購外國武器占軍事預算的比例，以 5% 國外武器占預算比例為對照組（虛線），可以發現不論是哪個政策程度，95% 信賴區間皆與 0 重疊；換言之，可以推論這個政策特徵，不管是哪一個等級，對於受訪者國防政策的偏好皆無顯著影響。受訪者對於這個政策特徵未呈現系統性偏好，可能原因之一是受訪者認為武器是否國造或向國外採購並不重要，因為相對於前三個政策特徵，雖然政府強調武器國造，但對受訪者而言，這仍然是離日常生活比較遙遠的議題。

最後在國防與社會福利預算的比例方面，受訪者傾向於支持相對平衡的分配，與對照組國防與社福預算比例的 50% 對 50% 分配（虛線），降低或是提高國防預算的比例，都會降低受訪者對於政策偏好的支持，降低國防預算比 20% 或是提高到 60%，皆會在 95% 信賴區間下，降低受訪者對國防政策 6% 的支持，而提高國防預算到 80% 則會大幅降低 15%。這一結果與「槍炮與奶油」文獻中提到的部分相符，受訪者在社會福利預算的排擠效應下，並不樂見政府提高國防預算；但比較有趣的發現是，如果降低國防對社福預算的比重，相對於 50% 對 50% 的對照組，也會降低受訪者對於國防政策的支持，即便這個對照基準的比重下，已經比我國 2023 年政府的支出在國防預算的比例還高。²¹ 這顯示在財政取捨上，民意對「大幅提高國防占比」的接受度有限，政策設計較可能需要以「有限度提高／維持平衡」的組合來取得支持。

綜合圖 1 的估計結果，臺灣民眾對國防政策組合的偏好呈現幾

21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我國 2023 年的社會福利預算總預算占比為 26.5%（新臺幣 8,310 億）、國防預算則為 14.9%（新臺幣 4,674 億）。若以比重進行換算，則現行國防對社福預算的比重為 40% 對 60%。

項清楚輪廓。首先，涉及「個人義務負擔」與「財政取捨」的政策特徵，對支持度的影響相對更明顯，顯示民意評估國防改革時會同時衡量動員強度與分配後果。其次，在後備動員設計上，教召頻率的平均影響幅度有限，但方向較一致：相較高頻方案，民眾更能接受較緩和、可預期的召集安排；然而，若政策擴大義務承擔範圍（例如將女性納入教召），支持度會顯著下降，凸顯「義務擴張」在政治可行性上的高敏感度。最後，在國防與社福預算分配上，民眾偏好維持相對平衡，對任何大幅傾斜的財政配置皆表現保留。整體而言，較可能取得支持的改革組合，是「有限度提升防衛能力」並同時避免「極端財政排擠」與「義務擴張」的方案；若改革同時觸及多個高敏感屬性，其政治可行性更仰賴跨屬性配套與說服論述。在上述整體偏好輪廓之下，以下進一步檢視不同人口特徵與政黨傾向是否系統性改變這些取捨，藉以辨識哪些群體最可能在「義務負擔」與「財政取捨」等高敏感議題上形成明顯分歧，並界定政策推動的可能阻力與溝通重點。

伍、人口特徵與政策偏好的異質性分析

以下檢視人口特徵與政黨傾向所帶來的偏好異質性。首先，針對性別比較其 MM 差異。圖 2 為受訪者性別間差異之 MM 差異比較，以男性為對照基準，若該政策特徵的信賴區間落於該圖中虛線的右側，則表示相對於男性，女性受訪者較支持該政策特徵，如圖 2 顯示，女性與男性在多數國防政策特徵上的評價趨於一致：無論是義務役期長短、教召頻率、武器軍購比例或國防與社福預算分配，其信賴區間跨越虛線，表示性別並未造成具體偏好差異；唯獨當政策直接觸及女性自身義務時（是否將女性納入教召）出現顯著且方向一致的落差，女性相對男性明確反對納入方案並偏好排除己身。此結果與「權益關切」的理論推論一致，意即性別差異主要於政策影響自我角色時才會凸顯，而在其他財政或裝備議題上，如同本文樣本，除直接牽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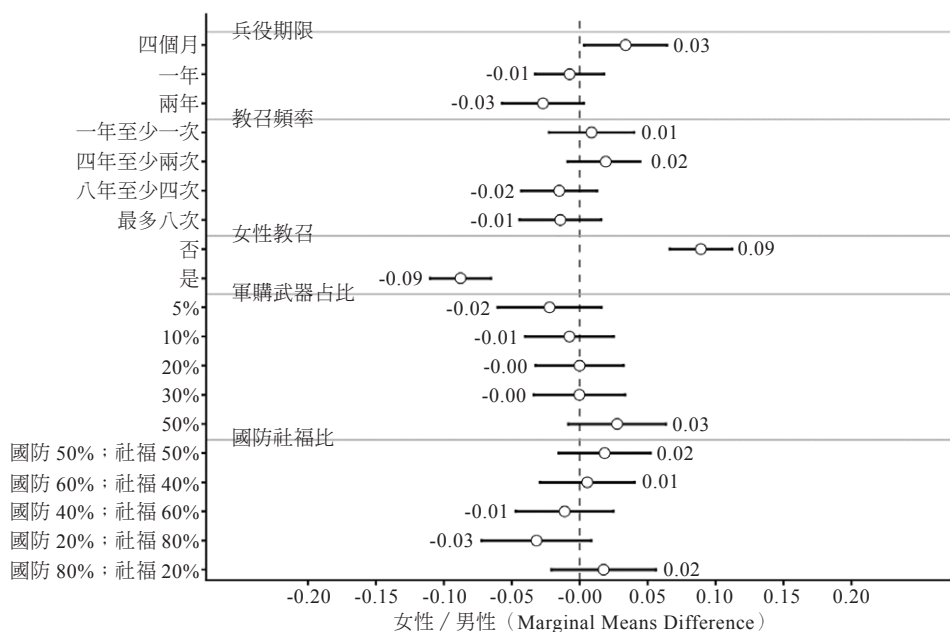


圖 2 性別差異對國防政策特徵偏好的差異 (MM 估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女性義務分配的屬性外，其餘屬性評價大致一致。

除了性別差異外，教育程度則影響受訪者對國防與財政取捨的資訊掌握與價值判斷，例如國防與社福預算的比重、國產裝備比例等議題，因此於圖 3 就受訪者教育程度²²比較其 MM 差異。如圖 3 所示，是否具有大專以上學歷之受訪者受教者在各項國防政策屬性上的邊際平均差異大多貼近 0，且 95% 信賴區間普遍跨越虛線，表示教育程度並未造成顯著分歧。整體來看，教育背景並未形塑結構化的政策偏好斷層，教育程度所帶來的資訊優勢或價值差異，可能僅在更技術性

²² 依國內相關研究慣例，教育程度達大專（含）以上者編碼為 1，其餘則編碼為 0。

或成本效益導向的討論中才會凸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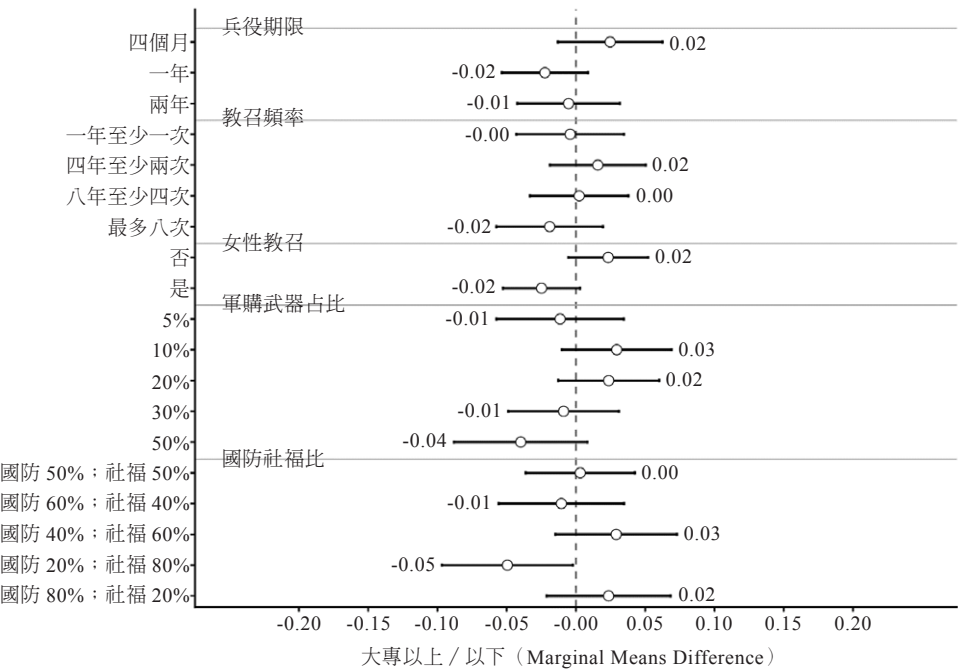


圖 3 教育程度差異對國防政策特徵偏好的差異（MM 估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除人口特質外，政黨偏好是臺灣公共意見最具結構性的分野之一，不僅反映特定政策認同，國內藍綠兩大陣營對國防與兩岸政策的立場更為迥異，自然使得政黨偏好成為解釋民意分歧的核心變項。因此，若僅檢視人口統計特徵而忽略政黨向度，將可能低估意識形態動員對政策偏好的形塑力。有鑑於此，本文除比較性別與教育差異外，更將受訪者依其政黨認同分為泛藍、泛綠與無特定政黨偏好三組，²³

²³ 根據「在目前國內的政黨中，哪一個政黨比較靠近您的理念？」此題作

並各別繪製邊際平均估計（圖 4），比較三組在兵役期限、教召頻率與對象、武器國產化比例，以及國防—社福預算分配上的偏好差異。

圖 4 呈現出政黨偏好在多項國防政策屬性上所造成的分歧遠甚於性別與教育。首先，就兵役期限而言，三組受訪者普遍傾向將役期由四個月延長為一年，且對一年制的接受度幾乎一致；然而，泛藍支持者對兩年制表現出更顯著的排斥，而泛綠與無政黨支持者則對兩年制態度相對中立。進一步觀察教召頻率，整體差異同樣有限，但仍可捕捉到細微差別：泛綠支持者最支持「四年至少兩次」的強化方案，與現行「八年至少四次」相比呈現較積極但可接受的折衷；無政黨者則傾向維持現行標準，而泛藍受訪者在此議題上並無明確方向性。至於女性是否納入教召，三組受訪者的平均偏好大致與全體樣本一致——整體不支持將女性強制納入，僅無政黨者的反對幅度略為加大，顯見其對性別課責議題尤為敏感。

在軍購武器國產占比部分，政黨傾向並未導致顯著差異：無論是完全依賴進口或全面國產化，三組支持度皆貼近 0.5，反映社會大眾對「外購＋自主」的比例應該如何並無明顯偏好，推估可能是受訪者並不理解此政策議題，因而在選擇上呈現五五波之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泛藍支持者對「極端依賴外購」的方案抱持顯著反對立場；然而，這是否等同於更積極支持「國艦國造」等自主武備政策，仍待進一步驗證。

此外，三類政黨偏好的受訪者大體上皆偏好「國防 40%；社福 60%」和「國防 50%；社福 50%」的政策級距，且對「國防 60%；社福 40%」無特定偏好，由此可知，不論政黨偏好，受訪者肯定現行的財政分配，並且也願意稍微地增加國防支出之比重。唯最鮮明的

分類：選擇國民黨、新黨、親民黨或民眾黨者編碼為「泛藍」；選擇民進黨、時代力量、綠黨、社民黨或樹黨者編碼為「泛綠」；其餘選項則編碼為「無特定政黨偏好」。

差異出現在國防—社福預算的極端分配，泛藍與無政黨受訪者對「國防 80%；社福 20%」的極端方案明顯低於 0.5，但兩者間並無顯著差異，雖然泛綠受訪者也同樣反對此政策級距，但程度遠低於前兩類受訪者：相對於極高的國防支出比重，泛綠支持者最為反對的政策級距為「國防 20%；社福 80%」，並且偏好社福比重略高於國防之支出模式，只是這發現不排除受到政策極端取值的影響，仍需後續研究予以釐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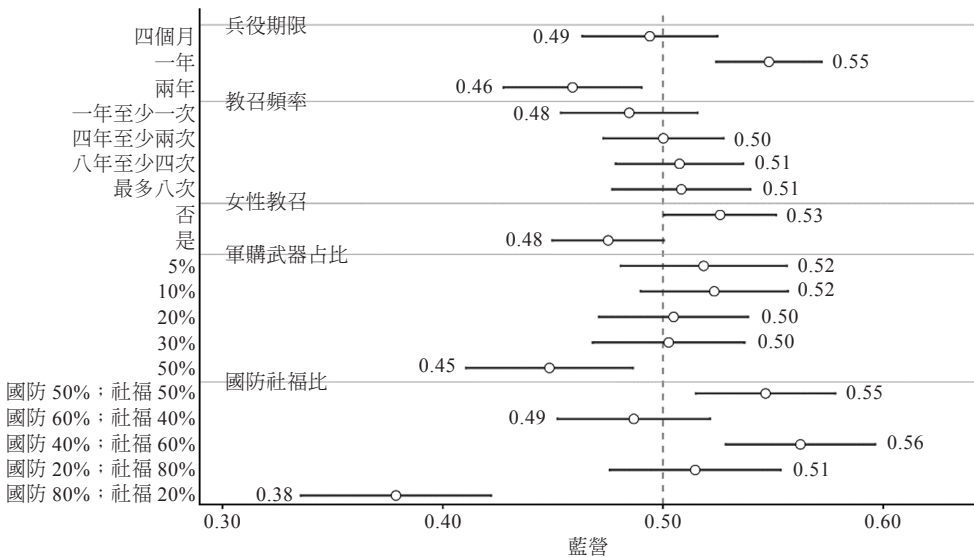
在安全研究與國防策略的經典與後續文獻中，外部威脅如何穿透國內政治結構，進而形塑民眾對軍事資源配置的態度，一直是核心議題。奧斯特洛姆（Charles W. Ostrom）和馬拉（Robin F. Marra）指出，美國的國防預算會因應蘇聯軍事支出的估計值而增加（Ostrom & Marra, 1986: 819-842）；但克普斯（Sarah Kreps）發現，當外部威脅提高時，菁英共識會影響聯盟的凝聚力，而公眾意見的影響則相對較小（Kreps, 2010: 191-215）。迪朱塞佩（Matthew DiGiuseppe）和席亞（Patrick Shea）則指出，當面臨外部威脅時，盟國的支持信號會影響一國的軍事努力程度（DiGiuseppe & Shea, 2021: 1067-1089）。基於此理論脈絡，本文以下將受訪者依主觀中國威脅感知分為高、低兩組，²⁴ 以檢驗「威脅感知—政策偏好」鏈結是否在各屬性具異質性，並評估受訪者是否因主觀的中國威脅感知而對國防政策有不同的偏好。

圖 5 為比較主觀中國威脅感知「高 / 低」兩組在各政策水準上的邊際平均差異。整體來看，威脅感知高低並未顛覆大多數受訪者對於政策級距的共同偏好：不論是役期長短、教召頻率與是否納入女性方

²⁴ 根據「如果我們用 0 表示完全沒有威脅，10 表示非常有威脅，請問在 0 到 10 之間，您覺得現在中國對我國的威脅有多少？」此題測量受訪者主觀的中國威脅感知，並以中位數為基準，將受訪者分為「高威脅感知」與「低威脅感知」。

面，皆無顯著差異，僅一年役期的政策級距在顯著邊緣，呈現微幅正向差距，顯示對中國有相對高的威脅感知受訪者偏好將兵役期間由四個月延長至一年，但對再延長至兩年並無明顯偏好。

真正顯著的差別集中在資源配置層面，首先，在國外軍購武器占比上，對中國有相對高的威脅感知受訪者對國外軍備比例顯示逐步上升的正向偏好，並相對排斥僅投入 5% 至 10% 的政策極距。換言之，當外部威脅被感知為迫切，受訪者更加傾向於依賴外國軍備，這可能是因為「國艦國造」等國內自主生產軍備等方案仍處於開發階段，較無法解決來自中國急迫威脅的短期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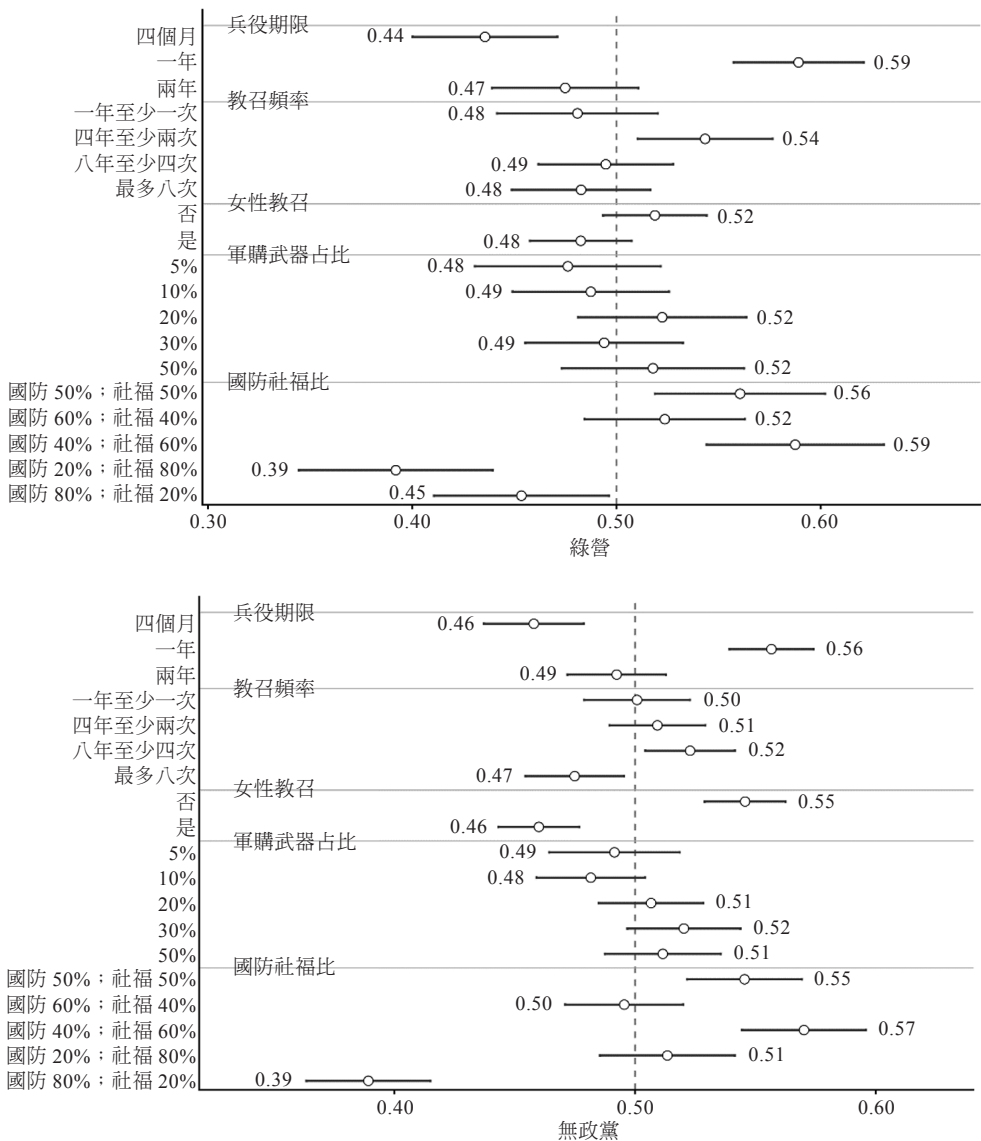


圖 4 政黨支持者對國防政策特徵的偏好 (MM 估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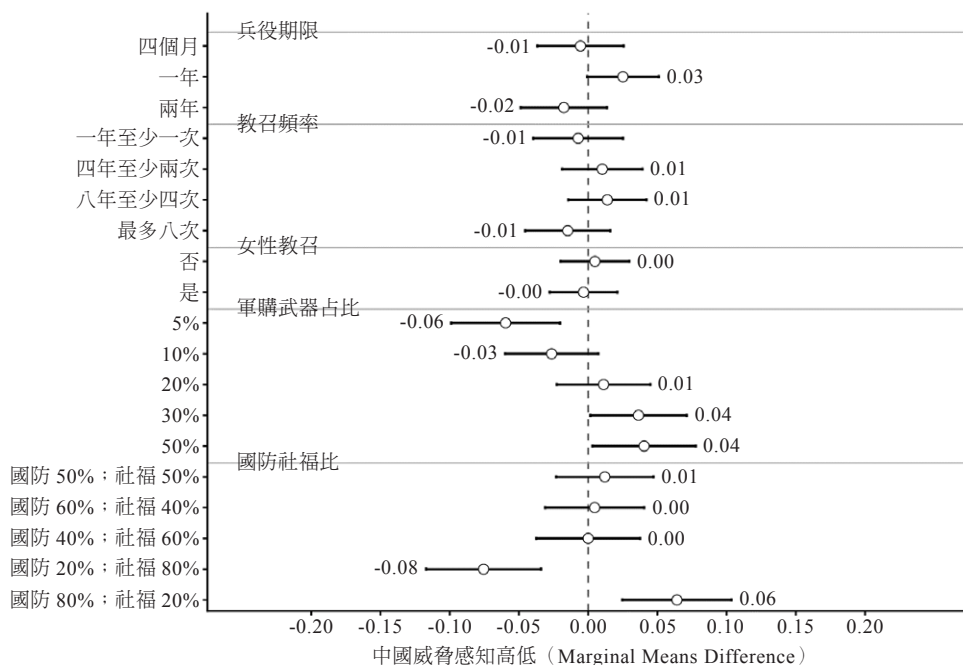


圖 5 中國主觀威脅感知對受訪者國防政策特徵偏好之差異 (MM 估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其次，在「國防—社福預算比」的政策屬性中，對中國有相對高的威脅感知受訪者顯著反對將國防壓低至 20% 的政策選項，並且強烈肯定將國防提高至 80% 的政策級距。由此可見，若受訪者對於中國威脅主觀感知高低有所落差，其異質性主要透過財政取捨面向驅動政策態度：高威脅者願意在社福支出上作出更大讓步以挹注國防。

綜合而言，本節的次群體分析顯示受訪者對國防政策的偏好僅在特定狀況下存在異質性：性別僅在直接攸關個人負擔的議題上有所差異，而與資訊接受理解能力相關的教育程度則幾乎無差別；另一方面，受訪者政黨偏好與中國威脅感知則對「錢要花在哪裡」的財政分

配產生決定性影響，泛綠與高威脅感知受訪者傾向提升國防占比，而泛藍、無政黨與低威脅感知受訪者則更重視社福支出。

陸、結論

本文運用聯合分析問卷調查實驗，評估民眾在多項國防政策屬性之間的取舍，進而描繪臺灣民意對國防政策組合的偏好輪廓。在東亞地緣政治壓力升高的背景下，整體結果顯示：受訪者對「適度」提升動員強度具有一定接受度（例如支持役期調整至一年），但對高強度動員（如更頻繁的教育召集）較為保留，顯示國防改革存在可被接受的政治邊界。進一步的次群體分析亦指出，受訪者的主要分歧更集中在資源分配取向，而非兵役措施本身：性別差異多在政策直接涉及女性自身義務分配時才顯著浮現，教育程度的差異相對有限；相對地，「資源應優先投入何處」的判斷，與政黨立場及對中國威脅的主觀感受呈現更一致的關聯。泛綠支持者與威脅感知較高者較傾向提高國防預算占比，而泛藍、無政黨認同及威脅感知較低者則較傾向維護社福支出。這意味著國防政策的政治可行性不僅取決於改革強度，也取決於政府能否掌握民眾對政策負擔、義務分配與財政取舍的具體看法，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具說服力的政策溝通與配套安排。

就政策意涵而言，本文並非直接評估何種國防政策最能提升防衛能力，也不是檢驗哪一種政策溝通策略最能說服民眾；本文貢獻在於透過聯合分析描繪民眾對不同國防政策組合的偏好結構，並從循證治理（Evidence-Based Governance）的角度，提供政府理解民意取舍的實證基礎。換言之，本文的政策啓示不在於提出單一的最佳政策方案，而在於指出國防改革的政治可行性必須建立在對民眾具體利害與政策取舍的理解之上。國家安全與外部威脅固然構成改革的重要背景，但若要將其轉化為對特定兵役或國防政策的穩定支持，政策溝通仍須回應民眾對政策負擔、義務分配與財政取舍的不同理解與可能疑

慮。因此，政府在推動兵役制度、後備動員或國防預算調整時，若能更清楚說明特定措施的必要性、負擔分配方式、財政影響與相關配套安排，將較有可能降低民眾對政策成本與資源配置的疑慮，並在不同政治立場與威脅認知的民眾之間尋求較廣泛的支持基礎。

上述國內政策設計問題也連結到臺灣如何在對外關係中展現防衛決心。尤其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背景下，臺灣能否維持具社會支持基礎的國防改革，成為其安全承諾可信度的重要條件。本文揭示受訪者雖然不願意將國防對社福預算的比重極端分布，但仍願意維持相對穩定的國防對社福支出比重，這更進一步展示了受訪者對於國家自我防衛決心的肯定。雖然本文問卷的設計未能測量聯盟文獻中關於訊號作用的機制，亦即受訪者對於國防政策組的特定偏好作為一種訊號，美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會如何詮釋？但若就政策時序上的觀察，美國作為臺灣安全保障的提供者，於我國政府逐步增加軍費、宣布兵役調整後，並未見美方對臺灣自我防衛意願提出質疑，²⁵ 並且主動提供臺灣一定額度的軍事援助，換言之，可初步推估調整後的國防政策組合已對美國釋放出一定的訊號，但美方究竟會如何解讀此訊號，則尚須進一步研究。未來的研究可以探討臺灣民眾對國防政策的支持如何被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解讀為對安全承諾的回應。這種研究可以檢視在高度緊張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民主國家的公眾輿論是否能夠，以及如何作為向盟友傳遞承諾的有效訊號。特別是在臺灣這樣的非正式盟友情況下，民意對國防政策的支持可能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

第三點則是本文仍有兩項根本性的局限，進而為後續研究揭示清晰的方向。首先，研究採用配額抽樣，重點在於確保內部效度以檢驗政策組合的因果效果，但並非機率抽樣；此外，受限於線上調查招募特性，年長族群樣本取得相對困難，可能導致高齡受訪者比例偏低。

25. 例如格雷迪（John Grady）（2018）認為，即便是蔡英文政府，臺灣在軍事準備和支出上仍有所不足，且有亟需加強之處。

故本文結果較適理解為在本研究樣本結構（性別與區域分布近似母體，但年齡等部分人口特徵未必完全貼近母體）下之民意反應；對其他未受配額控制之人口特徵，尤其高齡族群及整體母體之推廣，仍須審慎解讀。未來研究可考慮針對高齡族群補樣或採用分層機率抽樣，以提升外部代表性並強化跨年齡比較的穩健性。

其次，關於加權處理，本文未以全國民眾的人口結構權重對樣本進行後分層加權，主要理由在於：本文屬線上招募樣本，其可及母體更接近「可參與線上調查之網路使用者」而非全體國民；若逕以全國民眾人口結構權重加權，等同以不相符之母體分布強制校正樣本，可能反而引入額外偏誤或造成權重極端化，降低估計穩健性。因此，本文以未加權結果作為主要呈現，並將外部推廣的範圍界定為在本研究樣本結構下的民意反應；未來研究若欲提升對全體母體的推廣性，較適合採用更貼近目標母體的抽樣架構（例如分層機率抽樣或對特定族群補樣），並在樣本可支撐的前提下再進行後分層加權或校正。

第三，本文部分屬性取值係依政策語境以規範表述操作化，雖能貼近實際政策溝通，但亦可能使受訪者對級距差異的感知不如理論上清晰，進而降低個別屬性內部不同取值之可辨識性；以教召頻率為例，部分取值在年化後可能相近（如「四年兩次」與「八年四次」），使其 AMCE 呈現相對保守。惟本文核心發現主要由役期、女性教召與預算配比等屬性所驅動，整體結論不受此限制影響。

第四，聯合分析的優勢在於分析受訪者於多項政策特徵的組合間之取捨，但其並無法揭示受訪者作出權衡時的心理機制。欲說明「為何」及「如何」產生這些偏好，未來研究可結合因果中介分析量化不同考量（例如義務負擔或公平感）在決策中的相對權重，補足數據背後的認知與情感脈絡。

最後，本文的發現和未來研究方向將為預測和理解東亞安全態勢提供重要的分析視角。它們不僅對臺灣的國防決策提供實證基礎，也為評估東亞其他民主國家在類似安全壓力下的政策選擇提供參考，從

而豐富我們對這一關鍵時期區域安全動態的理解。

收件：2024 年 11 月 16 日

修正：2026 年 1 月 21 日

採用：2026 年 4 月 30 日

參考文獻

- 日本防衛省（2022）。令和 4 年版防衛白書。防衛省自衛隊。<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2/html/n110002000.html>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22). *Defense of Japan 2022*.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of Ministry of Defense.]
- 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中華民國 106 年國防報告書。中華民國國防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2017). *ROC National Defense Report 2017*.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 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中華民國國防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2019). *ROC National Defense Report 2019*.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 中華民國國防部（2023）。中華民國 112 年國防報告書。中華民國國防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2023). *ROC National Defense Report 2023*.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 中華民國國防部（2025）。中華民國 114 年國防報告書。中華民國國防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2025). *ROC National Defense Report 2025*.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 西尾邦明（2022）。防衛費 43 兆円「身の丈を超えている」元自衛隊現場トップの警鐘。朝日新聞，12 月 17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DJ3GD4QDHULFA03G.html> [Nishio, K. (2022). A Defense Budget of 43 Trillion Yen ‘Exceeds Our Means’: A Warning from A Former Front-line SDF Commander. *Asahi Shimbun*, December 17.]

- 吳玉山（2009）。權力不對稱與兩岸關係研究。載於包宗和、吳玉山（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頁 31-59）。五南圖書。[Wu, Y. S. (2009). Power Asymmetry and the Stud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Bau, T. H. & Wu, Y. S. (Eds.), *Revisiting Theorie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pp. 31-59). Wu-Nan Book.]
- 阮功松（2020）。從「避險」到「軟制衡」：美國的策略如何改變越南的中國政策，2014～2019。問題與研究，59（1），頁 143-193。https://doi.org/10.30390/ISC.202003_59(1).0004 [Nguyen, C. T. (2020). From Hedging to Soft Balancing: How the U.S. Strategy Changes Vietnam's China Policy, 2014-2019. *Issues & Studies*, 59 (1), pp. 143-193.]
- 李澄欣（2022）。台灣延長義務兵役至一年 蔡英文「困難決定」背後的壓力。BBC 中文網，12 月 27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4102726 [Li, C. H. (2022). Taiwan Extends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to One Year: The Pressure behind Tsai Ing-wen's 'Difficult Decision.' *BBC News Chinese*, December 27.]
- 張仕仁（2023）。美日韓峰會針對中國威脅 惟日本國民不支持加稅增軍費。自由亞洲電台，8 月 21 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jp-tax-08212023081503.html [Zhang, S. R. (2023). The U.S.-Japan-South Korea Summit Targets the China Threat, Yet Japanese Citizens Oppose Tax Hikes to Raise Military Spending. *Radio Free Asia*, August 21.]
- 陳勁甫、李樹幹（2006）。從「權力轉移」理論的動態觀點論中華民國嚇阻戰略。國際關係學報，（22），頁 85-128。https://doi.org/10.30413/TJIR.200607_(22).0003 [Chen, C. P. & Lee, S. K. (2006). Evaluation of ROC's Deterrence Strategy from the Dynamic Viewpoints of Power Transitions Theor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2), pp. 85-128.]

陳偉華（2010）。從「安全困境」至「防衛困境」：臺灣國防的反思與策勵。遠景基金會季刊，**11**（3），頁 59-97。https://doi.org/10.7063/PQ.201007.0059 [Chen, W. H. (2010). From 'Security Dilemma' to 'Defense Dilemma': Reflections and Options of Taiwan's National Defense. *Prospect Quarterly*, 11 (3), pp. 59-97.]

陳偉華（2014）。「反軍事風尚」形成對臺灣國防安全之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15**（4），頁 63-103 [Chen, W. H. (2014). Formation of an Anti-Military Fashion and Its Impact on Taiwan's Defense Security. *Prospect Quarterly*, 15 (4), pp. 63-103.]

黃子杰、張梓嘉（2023）。首次女性教召 220 人 5 月入營 採舊制受訓 5 至 7 天。公視新聞網，3 月 17 日。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27965 [Huang, Z. J. & Zhang, Z. J. (2023). First Female Reservist Call-up: 220 to Report in May under the Old 5-to-7-day Training System.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News*, March 17.]

黃紀、傅澤民（2025）。聯合網調實驗：理論與實務。五南圖書。[Huang, C. & Fu, T. M. (2025). *Conjoint Online Survey Experiments: Theory and Practice*. Wu-Nan Book.]

楊仕樂（2009）。軍事的專業或政治的考量？對「豪豬戰略」批判的反思。遠景基金會季刊，**10**（4），頁 85-123。https://doi.org/10.7063/PQ.200910.0085 [Yang, S. Y. (2009). Military?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the Critiques of 'Porcupine Strategy.' *Prospect Quarterly*, 10 (4), pp. 85-123.]

薛健吾（2022）。扈從、避險、抗衡、孤立？初探臺灣四種對中政策態度的民意基礎。臺灣民主季刊，**19**（1），頁 83-133。[Hsueh, C. W. A., (2022). Bandwagoning, Hedging, Balancing, or Isolationism? Probing Taiwanese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se Four China Policy Alternatives.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9

(1), pp. 83-133.]

- Asal, V., Conrad, J., & Toronto, N. (2017). I Want You! The Determinants of Military Conscrip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7), pp. 1456-1481.
- Bakir, A., Mason, R., Rossiter, A., & Müller, T. (2025). Beyond Import Dependence: Defence Industry Localisation Strategies in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States.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41 (4), pp. 553-560.
- Bansak, K., Hainmueller, J., Hopkins, D. J., & Yamamoto, T. (2021). Conjoint Survey Experiments. In Druckman, J. N. & Green, D. P.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pp. 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nsak, K., Hainmueller, J., Hopkins, D. J., & Yamamoto, T. (2023). Using Conjoint Experiments to Analyze Election Outcomes: The Essential Role of the Average Marginal Component Effect. *Political Analysis*, 31 (4), pp. 500-518.
- Bartels, L. M. (1991). Constituency Opinion and Congressional Policy Making: The Reagan Defense Buildu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2), pp. 457-474.
- Blanes, I. E. G., Gillooly, S. N., Peterson, S., & Tierney, M. J. (2023). Poll: What Is the Likelihood of War Over Taiwan?. *Foreign Policy*, April 1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4/13/china-attack-taiwan-war-expert-poll-biden/>
- Blankenship, B. (2020). Promises under Pressure: Statements of Reassurance in U.S.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4 (4), pp. 1017-1030.
- Blankenship, B. (2021). The Price of Protection: Explaining Success and Failure of U.S. Alliance Burden-Sharing Pressure. *Security*

- Studies*, 30 (5), pp. 691-724.
- Cave, D. (2023). An Anxious Asia Arms for a War It Hopes to Preven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25/world/asia/asia-china-military-war.html>
- Choulis, I., Bakaki, Z., & Böhmelt, T. (2021). Public Support for the Armed Forces: The Role of Conscription.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32 (2), pp. 240-251.
- Coppock, A. (2019). Generalizing from Survey Experiments Conducted on Mechanical Turk: A Replication Approach.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7 (3), pp. 613-628.
- Cox, G. W. & Dincecco, M. (2021). The Budgetary Origins of Fiscal-Military Prowes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3 (3), pp. 851-866.
- Czulda, R. (2014). The Military Security Policy of Taiwa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Pacific Focus*, 29 (1), pp. 8-43.
- DiGiuseppe, M. (2015). The Fiscal Autonomy of Deciders: Creditworthiness and Conflict Initia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1 (3), pp. 317-338.
- DiGiuseppe, M. & Shea, P. E. (2021). Alliances, Signals of Support, and Military Effor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7 (4), pp. 1067-1089.
- Dill, J., Howlett, M., & Müller-Crepon, C. (2024). At Any Cost: How Ukrainians Think about Self Defense Against Russi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8 (4), pp. 1460-1478.
- Flores-Macías, G. A. & Kreps, S. E. (2013). The Foreign Policy Consequences of Trade: China's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1992-2006.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5 (2), pp. 357-371.

- Fordham, B. O. & Walker, T. C. (2005). Kantian Liberalism, Regime Type, and Military Resource Allocation: Do Democracies Spend L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9 (1), pp. 141-157.
- Gannon, J. A. & Kent, D. (2021). Keeping Your Friends Close, but Acquaintances Closer: Why Weakly Allied States Make Committed Coalition Partne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5 (5), pp. 889-918.
- Godefroidt, A. & Langer, A. (2023). What Drives Attitudes Towards the Reintegration of Former Fighters? Insights from a Conjoint Experiment in Nigeri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0 (3), pp. 410-427.
- Goh, E. (2005).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 Grady, J. (2018). Panel: Taiwan Defense Spending Doesn't Back Up Taipei's Rhetoric. *USNI News*, May 31. <https://news.usni.org/2018/05/31/panel-taiwan-defense-spending-doesnt-back-taipeis-rhetoric>
- Green, C. (2023). South Korea and Japan Try to Mend Ties Without Stirring Trouble. *Foreign Policy*, April 1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4/12/south-korea-japan-summit-diplomacy-yoon-suk-yeol-fumio-kishida/>
- Hadar, M. & Häkkinen, T. (2020). Conscription and Willingness to Defend as Cornerstones of National Defense in Israel and Finland. *Journal of Political & Military Sociology*, 47 (2), pp. 188-218.
- Hainmueller, J. & Hopkins, D. J. (2015). The Hidden American Immigration Consensus: A Conjoint Analysis of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3), pp. 529-548.

- Hainmueller, J., Hopkins, D. J., & Yamamoto, T. (2014). Causal Inference in Conjoint Analysis: Understanding Multidimensional Choices via Stated Preference Experiments. *Political Analysis*, 22 (1), pp. 1-30.
- Hartley, T. & Russett, B. (1992).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on Defense: Who Governs Military Sp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4), pp. 905-915.
- Higgs, R. & Kilduff, A. (1993). Public Opinion: A Powerful Predictor of U.S. Defense Spending.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4 (3), pp. 227-238.
- Horiuchi, Y. & Tago, A. (2024). U.S. Military Should Not Be in My Backyard: Conjoint Experiments in Japa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8 (9), pp. 1798-1824.
- Horiuchi, Y., Markovich, Z., & Yamamoto, T. (2022). Does Conjoint Analysis Mitigate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Political Analysis*, 30 (4), pp. 535-549.
- Horowitz, M. C. & Levendusky, M. S. (2011). Drafting Support for War: Conscription and Mass Support for Warfar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3 (2), pp. 524-534.
- Horowitz, M. C., Poast, P., & Stam, A. C. (2017). Domestic Signaling of Commitment Credibility: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8), pp. 1682-1710.
- Kaarkoski, M. & Häkkinen, T. (2022). The Legitimacy of Conscription in Democracy: Connections between Conscription 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 in Parliamentary Debates in Finland and Sweden in the 2010s. *Journal of Political & Military Sociology*, 49 (2), pp. 195-218.
- Kelter, F. (2023). Taiwan's Outlying Islands Are at Risk. *Foreign*

- Policy*, January 1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6/taiwan-kinmen-matsu-outlying-islands-china-war-risk/>
- Kinsella, D. (1998). Arms Transfer 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5 (1), pp. 7-23.
- Kiratli, O. S. (2024). Policy Objective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A Conjoint Experiment from U.S. and Turkey. *Political Behavior*, 46 (2), pp. 1257-1279.
- Kofroň, J. & Stauber, J. (2024). Spending on Personnel or Equipment: Panel Analysis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the NATO Countries 2005-2019. *European Security*, 33 (4), pp. 665-689.
- Kreps, S. (2010). Elite Consensus as a Determinant of Alliance Cohesion: Why Public Opinion Hardly Matters for NATO-led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6 (3), pp. 191-215.
- Kriner, D. L. & Shen, F. X. (2016). Conscription, Inequality, and Partisan Support for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 (8), pp. 1419-1445.
- Kriner, D., Lechase, B., & Cappella Zielinski, R. (2018). Self-interest, Partisanship, and the Conditional Influence of Taxation on Support for War in the USA.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5 (1), pp. 43-64.
- Kuik, C. C.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30 (2), pp. 159-185.
- Leeper, T. J., Hobolt, S. B., & Tilley, J. (2020). Measuring Subgroup Preferences in Conjoint Experiments. *Political Analysis*, 28 (2), pp. 207-221.
- Liff, A. P. (2019). Unambivalent Alignment: Japan's China Strategy,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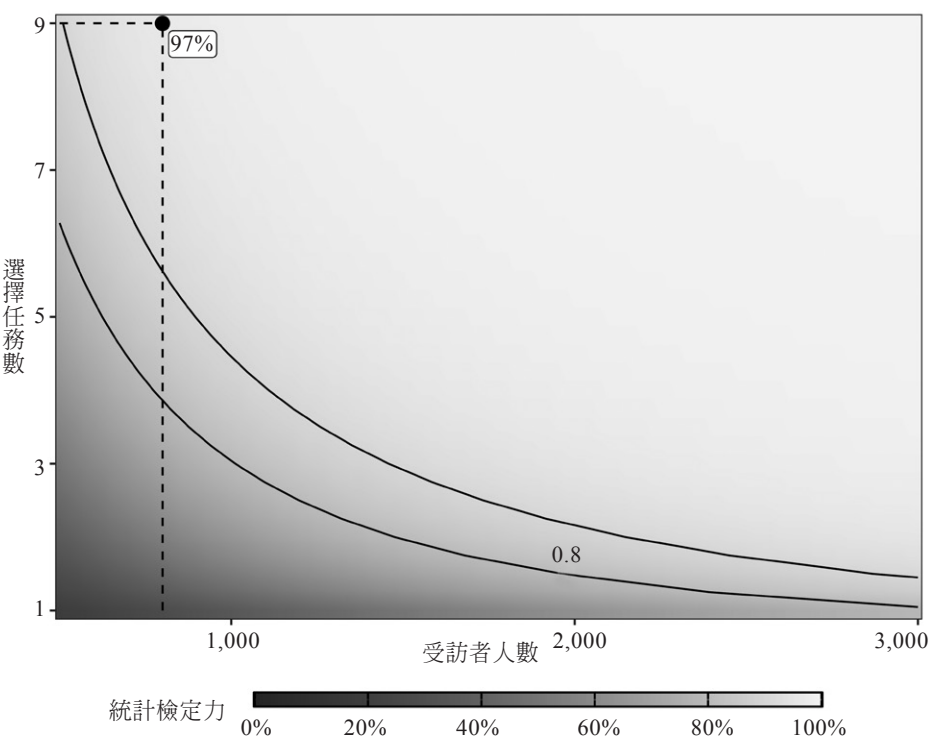
- U.S. Alliance, and the ‘Hedging’ Fall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9 (3), pp. 453-491.
- Lukac, M. & Stefanelli, A. (n.d.). Conjoint Experiments: Power Analysis Tool. *shinyapps.io*.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26. <https://mblukac.shinyapps.io/conjoints-power-shiny/>
- Medeiros, E. S. (2005).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9 (1), pp. 145-167.
- Mintz, A. (1989). Guns Versus Butter: A Disaggregated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4), pp. 1285-1293.
- Morrow, J. D. (1993). Arms Versus Allies: Trade-Offs in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2), pp. 207-233.
- Mullinix, K. J., Leeper, T. J., Druckman, J. N., & Freese, J. (2015).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Survey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2 (2), pp. 109-138.
- Oneal, J. R. & Russett, B. (1999). 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6 (4), pp. 423-442.
- Ostrom, C. W. & Marra, R. F. (1986). U.S. Defense Spending and the Soviet Estim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3), pp. 819-842.
- Palmer, G. (1990). Alliance Politics and Issue Areas: Determinants of Defense Spe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1), pp. 190-211.
- Poutvaara, P. & Wagener, A.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scription. In Coyne, C. J. & Mathers, R. L. (Eds.), *The Handbook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pp. 154-176).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Reynolds, I. (2022). Japan Set to Become One of World’s Biggest

- Defense Spenders. *Bloomberg*, August 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8-25/japan-set-to-become-one-of-world-s-biggest-defense-spenders?leadSource=uverify%20wall>
- Russett, B. (1982). Defense Expenditures and National Well-Be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4), pp. 767-777.
- Russett, B. (1990). *Controlling the Sword: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pindel, J. (2025). Boom, Bling, Backbone, or Blip? The Signaling Inherent in Arms Transf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9 (3), pp. 164-204.
- Tomz, M., Weeks, J. L., & Yarhi-Milo, K. (2020). Public Opinion and Decisions About Military Force in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4 (1), pp. 119-143.
- Tsai, C. H., Chang Liao, N. C., Lee, C. Y., & Yu, C. H. (2024).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U.S. Security Assurance on Taiwanese Public's Defense Resolve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JAES 2024 Annual Meeting*, May 18-19, 2024, Kochi, Japan.
- Willardson, S. L. & Johnson, R. A. (2022). Arms Transfe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ituating Military Aircraft Sales in the Broader IR Contex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9 (2), pp. 191-213.
- Williams, L. K. (2019). Guns Yield Butter? An Exploration of Defense Spending Preferenc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3 (5), pp. 1193-1221.
- Wu, C. K. S., Chen, F. Y., & Yeh, Y. Y. (2023). Public Support for Self-Defence in Taiwan: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Taiwan Politics*, November 17. <https://taiwanpolitics.org/article/90278->

public-support-for-self-defence-in-taiwan-the-current-state-of-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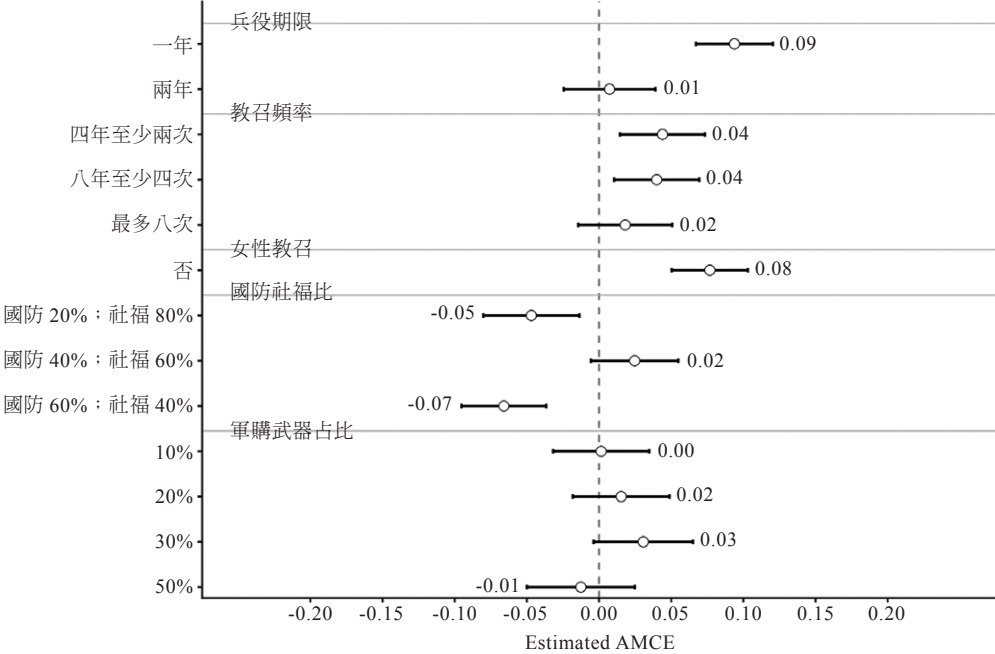
- Wu, C. L. & Lin, A. M. W. (2024). Will the United States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4 (1), pp. 131-170.
- Wu, C. L. & Lin, A. M. W. (2026). Framing Motives and Objectives: Which Frames Increase U.S. Public Support for Defending Taiwa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07 (1), e70126.

附錄一
聯合分析設計的檢定力（Power）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說明：聯合分析設計：800 位受訪者、九個選擇任務、假設效果量 0.05、該屬性含五個層級。圖中曲線分別為檢定力 0.8 與 0.9 之門檻。

附錄二
限縮樣本之民眾對國防政策特徵的偏好
(AMCE 估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附錄三

詳細問卷與題項

變數名稱	問卷題目	選項
性別	請問您的性別是？	1- 男性 2- 女性 3- 非二元性別者 / 第三性別者
年齡	請問您是西元哪一年出生的？	出身年分 -2023
教育程度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	1- 未入學 2- 小學 3- 國、初中 4- 專科 5- 大學 6- 碩士以上
收入	請問您個人平均每個月所有的（稅前）收入差不多有多少？	0-24,000 以下 1-24,001~34,000 2-34,001~44,000 3-44,001~53,000 4-53,001~61,000 5-61,001~72,000 6-72,001~84,000 7-84,001~100,000 8-100,001~130,000 9-130,001 以上
中國主觀威脅感知	如果我們用 0 表示完全沒有威脅，10 表示非常有威脅，請問在 0 到 10 之間，您覺得現在中國對我國的威脅有多少？	0 完全沒有威脅 10 非常有威脅
政黨支持	在目前國內的政黨中，哪一個政黨比較靠近您的理念？	1- 國民黨 2- 民進黨 3- 時代力量 4- 民眾黨 5- 新黨

變數名稱	問卷題目	選項
		6- 親民黨 7- 台聯 8- 綠黨 9- 社民黨 10- 樹黨 11- 其他、都支持、看情形、無意見
政黨偏好	若把臺灣的政治陣營略區分成泛綠及泛藍，您會怎麼形容自己的立場？	1- 強烈的泛綠支持者 2- 不是很強烈的泛綠支持者 3- 獨立選民，立場上較接近泛綠 4- 獨立選民，立場上不偏泛綠也不偏泛藍 5- 獨立選民，立場上較接近泛藍 6- 不是很強烈的泛藍支持者 7- 強烈的泛藍支持者 8- 其他，請註明
統獨立場	關於臺灣和大陸的關係，有下面幾種不同的看法，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1- 盡快統一 2-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3- 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 4- 永遠維持現狀 5-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6- 儘快宣布獨立
國族認同	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臺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1- 臺灣人 2- 中國人 3- 都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ploring Public Preferences Over Taiwan's Defense Policy Through Conjoint Analysis

Wei-hao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recent military expansion has fueled an intensifying arms race in East Asia, accompanied by the U.S. strategic pivot to the region, making Taiwan's defense policies and public opinion a focal point of regional security concerns. Taking Taiwan as a case, this study employs a conjoint survey experiment to explore how democracies balance public opinion with defense needs, addressing a gap in the defense policy literature, which has largely examined single policy elements without systematically incorporating public opin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pondents tend to support moderate extensions of mandatory military service but remain hesitant about frequent reserve training, and prefer a balance between defense and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Subgroup analyses further reveal that preferences vary by gender, partisan alignment, and perceived threat from China. Taken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n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Taiwan's defense policymaking and offer useful insights for other East Asian democracies facing similar security pressures, thereby enrich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lated theories in highly tense regional contexts.

Keywords: Defense Policy, Public Opinion, Conjoint Analysis, Conscription, Gun-And-Butter

